

论上博简〈季庚子问于孔子〉、〈孔子见季桓子〉的 叙事功能与政治记忆

陈曙光

香港教育大学中国语言学系 香港

【摘要】传世文献如《论语》、《礼记》里的孔子，往往呈现道德教化的倾向。即使《论语》有季康子向孔子问政的记载，往往只为表达儒家的重要政治主张。惟在战国的出土文献里，编者透过孔子与季氏的问答，却呈现出孔子作为“政治顾问”的形象。本文以战国出土的上博简〈季庚子问于孔子〉、〈孔子见季桓子〉为核心材料，运用叙事学与文化记忆理论，分析楚简“孔子与大臣”问答方式的叙事功能与当中的政治记忆。这些文献记载孔子与鲁国实际掌权者季氏父子的政治对话，其叙事呈现稳定的结构。本文认为这些文本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通过建构“虚心问政”的场景，将孔子定位为“重要的政治人物”。而文本里季氏大臣更被塑造出类近孔门弟子的形象，包括谦逊、好学等。这种稳定的问答方式具有明确的记忆功能，它为战国儒家参与实际政治提供典范，将孔子的权威转化为政治话语权。本文进一步运用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分析这些文献从口传到书写的转化过程，分析文本的集体认同功能，以及汉代以后被“有意识遗忘”的原因。

【关键词】出土楚简；孔子；弟子；文化记忆；叙事

【基金项目】香港研究资助局优配研究金（GRF 18600523）：新出土战国楚简“孔子与时人对答”叙事研究

【收稿日期】2026 年 7 月 5 日

【出刊日期】2026 年 8 月 3 日

【DOI】10.12208/j.ssr.20260253

The narrative functions and political memory in the Chu bamboo slips *Jigengzi Questions Confucius* and *Confucius Meets Ji Huanzi*

Shuguang Ch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Abstract】The transmitted classics such as the *Analects* and the *Rites* often portray Confucius in a predominantly moral and pedagogical capacity. Even where the *Analects* recorded Jikangzi's question to Confucius about governance, the account is usually framed primarily to express Confucianism's central political ideas. By contrast, in excavated manuscripts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editors use the Q&A between Confucius and the Ji's family to construct an image of Confucius as a “political consultant.” Drawing on narrative and cultural memory theories, this paper put focus on the *Jigengzi Questions Confucius* (〈季庚子问于孔子〉) and *Confucius Meets Ji Huanzi* (〈孔子见季桓子〉) from the Shanghai Museum Chu Bamboo Slips. It analyzes the narrative functions of the Chu slips' “Confucius and minister” mode of questioning and the political memory embedded. These texts record political dialogues between Confucius and the Ji's family; their narrative structures are relatively stabl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Confucian school positioned Confucius a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figure” by constructing the minister humble inquiry to Confucius. Within these texts, the Ji ministers are shaped into figures resembling Confucian disciples, characterized by virtues such as humbleness and a love of learning. The stable Q&A format performed a clear mnemonic function; it provided a model for Ru scholars' engagement in real politics and converts Confucius's authority into political discourse power. The paper further applies Assmann's cultural memory theory to examine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from oral to written form. It analyzes the texts' functions in generating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to explain why certain images were selectively “forgotten” after the Han dynasty.

【Keywords】Excavated Chu bamboo slips; Confucius; Disciples; Cultural memory; Narrative

1 引言

孔子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现代人所认知的孔子，是经过历代统治者和学者按照当时需要，不断诠释和建构而成。在传世文献，如《论语》、《礼记》、《史记》里，孔子更多以坚守道德典范的至圣先师形象出现。政治上则强调其不用于世，仍不会苟合取容。如《史记》记载“（卫灵公）不用孔子”、“孔子既不得用于卫”、（颜渊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1]《论语》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透过孔子在政治的失意突显其坚持理想的伟大。即使《论语》记述季康子曾问政于孔子，都是简洁语录。文本利用执政者的提问，目的是引出孔子发表意见，而非重现一场真正的政治对话。这种叙事模式在传世文献里经常出现，孔子的意见被简化成为一句句格言，如“政者，正也”、“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等等，旨在宣扬儒家重要的政治理念。目前的传世文献里，孔子的言论和行事散见不同典籍，包括《论语》、《庄子》、《礼记》等等。当中牵涉文献的完成时代；编者的学派或学术主张；文献内容是承传、发扬、批判或调侃等。对于一些有争议的文献，例如《孔子家语》，不同学者会因为自己的研究而选择是否相信该材料。即使是目前公认最能代表孔子思想的《论语》，也有学者提出质疑，例如崔述透过称谓的不同，认为《论语》后十篇是后出的。部分西方学者更为激进，如胡明晓（Michael Hunter）甚至认为《论语》的成书迟于《孟子》和《史记》，根本动摇孔子研究的立足点^[2]。杨朝明指出：“由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所决定，对孔子思想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中国儒学与传统文化的评价与态度。而从根本上说，人们对孔子褒贬不一，是源于对《孔子遗说》的不同认识与理解。”^[3]然而，战国出土楚简提供了文献相对原始的面貌。目前无论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都只是战国文本世界的一小部分，是文献散佚或被有意筛汰的结果，要完全重构先秦文献的生成和流传机制几近不可能。不过其中的“指纹”对我们了解先秦的文本传播仍有启发。出土的不同楚简都有与孔子相关记述，再加上散见传世文献的记载，至少可以肯定他是战国时代重要的文化记忆，也是不同学者必须对话的对象。其中上博简有孔子与季国大臣问对的长篇文本，展现孔子备受鲁国执政者尊敬的形象，这与传世文献明显不一致。本文以《季庚子问于孔子》（以下简称《季庚子》）、《孔子见季桓子》（简称《季桓子》）为对象^[4]。核心问题是楚简编者创作了孔子与季氏的对话，与传世文献是否相同？这种

叙事策略承载编者的甚么意图和政治记忆？

目前，出土文献的研究方兴未艾，不过研究仍有所侧重。顾史考（Scott Cook）指出学者容易出现“贪新弃旧”和“忠贞不渝”两种问题^[5]。台湾省的李隆献归纳研究的情况，指出问题包括偏重文字考释；对出土文献推崇过高及缺乏整体性论述^[6]。同样情况亦见于孔子相关的文献研究。上博《季庚子》共有 23 支简，主要记录季康子向孔子请教治国和修身等重要问题。孔子强调统治者必须施以仁德和赏罚分明等。《季桓子》共有 27 支简，记载季桓子认为自己的能力和德行不足，孔子回答反映了儒家对于“仁”与“礼”之间的的关系，两文与传世儒家文献的思想高度相合，例如文本里的人物（包括孔子与季氏）都强调德行的重要，是研究战国学术思想嬗变的重要材料。对于这两文本，李锐、陈剑等数十位重要学者都对其编联和个别文字的考释发表专文^[7]。许懋慧和洪淑玲分别以这两篇独立撰写硕士论文^[8]。顾史考（Scott Cook）的专著《上博竹书孔子语录文献研究》把孔子文献作为整体研究，分为“弟子接闻于夫子及孔子应答弟子之短语”、“应答鲁公及弟子的长篇对话”及“应答公卿士大夫的长篇对话”等部分。本文整理不同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仍以文本整理和文字考释为主，缺乏从叙事学与文化记忆理论角度对文本生成机制的系统探讨^[9]。

本文尝试结合叙事学与记忆理论，分析两篇文献里孔子与季氏问答的叙事结构以及人物形象所承载的政治记忆。叙事学方面，借鉴热奈特（Gerard Genette）的“聚焦”（focalization）概念^[10]，分析文本通过谁的视角呈现事件以及所带来的效果。文化记忆理论方面，运用扬·阿斯曼（Jan Assmann）的“功能性记忆”（funktionales Gedächtnis）^[11]，分析文献的生成与散佚如何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求。

2 《季庚子》、《季桓子》的叙事特色

2.1 以季氏视角建构孔子地位

《论语》记载了季康子与孔子之间的对答有 6 次，其中 4 次与政事直接相关，兹引述如下：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颜渊）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

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12]

《论语》的记载相当简单，就是季康子询问孔子对某些主张或问题的看法，然后孔子简单回答后，对话便停止。既没有铺陈背景和塑造人物形象，孔子也没有再详细说明主张的内容。作为孔子最重要的语录，《论语》的作用是勾勒孔子的言行与各方面的主张，而非详细阐述儒家学说的内核。即使《论语》有较长篇的记述，例如著名的“侍坐章”，也是不同的弟子各言其志，子路谈论军事、冉求讨论管治、公西华则关于祭祀^[13]，除了孔子，发言人之间只是平行关系，并非透过层层提问深入阐述理念。

传世文献里并非没有这种追问式的讨论，例如《礼记·孔子闲居》（与上博《民之父母》及《孔子家语·论礼》属相同一谱系的文献）便记载子夏问到何谓“民之父母”、“五至”、“三无”等^[14]。这种记载多出现在孔子与弟子的问答里，很少出现在与其他政治人物的对话。在《季庚子》里，叙事者以季康子的提问开展：“肥从有司之后，一不知民务之焉在，唯子之谏。请问：君子之从事者于民之上，君子之大务何？”^[15]季康子自称“肥”，自谦“一不知民务之所在”，更重要是表明完全听从孔子的教诲。《论语》里的季康子只是提问者，其形象扁平，也看不出对孔子是尊敬还是鄙视；而在简文中，季康子被赋予了丰富的内心活动与谦卑的姿态，他更像以孔子追随者的身份请教。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叙事始终以季康子的提问带动。每一章的转换均由季康子的追问完成，从“君子之大务何”到“何谓仁之以德”，再到“强权统治”的质疑，最后探讨“宽政”。这种结构使季康子成为叙事重心，因为治国遇到难题而需要向有智慧者请教，而孔子只是“回应者”，而非下级主动向上司条陈建议。

《季桓子》首句是“孔子见季桓子”，表明是孔子主动求见或拜访季桓子。叙事却以季桓子的自我陈述开始，季桓子云：“斯闻之，盖贤者是能亲仁……如夫亲仁、行圣人之道，则斯不足，岂敢望之？”^[16]他同样自称“斯”，先表达对“亲仁”、“行圣人之道”的向往，再自谦“不足”、“岂敢望之”，最后请求孔子详细说明（“悉言之”）。这种叙事结构既表达季桓子的谦逊，同时也与孔子作对比。一位自知不足的人向别人请教，那么所请教的人必然能亲仁、行圣人之道的人物。表面上季康子、季桓子主导了对话；实际上，文本透过鲁国掌握实权的人不断追问孔子，一步步将孔子推向

更高的权威位置。孔子由提出纲领到详细解说主张，完整展示出其政治智慧以及受国家重视的程度。热奈特的叙事理论区分“外聚焦”（只呈现外部行为，不进入人物内心）、“内聚焦”（通过特定人物的视角呈现事件）与“零聚焦”（全知叙事）。这两篇表面上是“外聚焦”的客观记录，实际上却是通过季氏的视角呈现孔子的地位，是“内聚焦”呈现。读者代入季氏的目光看待孔子，这种“以他者建构主体”的叙事策略，比直接宣称孔子的伟大更具说服力。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清华简中的其他问答文献。例如《平王问郑寿》记述楚平王向郑寿问及国家遭遇挫败时的对应方法^[17]；《庄王既成》记述庄王询问沈尹子綰楚国的霸业可以维持多久^[18]。两篇虽然同样采用“某问某”的标题形式，但叙事者无意透过对话建构问者或答者的权威，而是一场政治咨询。文本未有把平王、庄王塑造成为谦虚求教的君主，文本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两人对答的内容。这种差异揭示了《季庚子》、《季桓子》的特殊性，文本除了传播孔子对于政治问题的具体看法外，这些主张是由“孔子”所说是同样重要的信息。

2.2 稳固的叙事结构固化记忆

两篇文献在叙事结构上呈现模块化的特征，形成稳定的“问、答、证”结构。这种结构反复出现，并非单纯的叙事需要，而是有“记忆固化”功能。通过重复的叙事模式，将特定的政治记忆绑定并嵌入信息接收者的认知。《季庚子》可以清晰地辨识出“问、答、证”模式的反复操作。由季康子提问：“君子之大务何？”孔子回答：“仁之以德，此君子之大务也。”季康子追问：“何谓仁之以德？”^[19]孔子进一步阐述，在论述过程中，孔子引管仲之言以证。在讨论“修养德性”、“强权统治”部分，孔子对自己听自“孟孙侧”、“臧文仲”之说，这是“证”的环节，形成稳定的叙事框架。《季桓子》同样呈现出类似的结构，重要的推进都是以季桓子的提问开启，无论讨论的主题是“修身成德”还是“二道之辨”，叙事模式始终不变^[20]。

两篇文献与孔门弟子问对文献的结构高度相似。上博简《仲弓》记载仲弓被任命为季宰，却没有自信，害怕令孔子蒙羞而想推辞，孔子勉励后加以引导。接着仲弓便问“为政何先”，孔子提出了“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宥过赦罪”的总纲后，仲弓以“先有司为之如何”、“举才如之何”、“宥过赦罪，则民何惩”等逐点提问。孔子一一回答后，仲弓最后又问到“民务”^[21]。以问者不自信的表现切入，再不断就孔子的回答追问，《仲弓》与《季桓子》的叙事结构如出一辙。《颜渊问

于孔子》遵循类似模式，整理者以首句为题，而复旦吉大古文字专业研究生联合读书会指出“颜渊问于孔子并非首句；此句上仍有一残字，足见此简亦非首简。然原整理者所拟篇题尚切合现存简文内容，故我们沿用之。”^[22]按照文献常见的叙事，前文或交代颜渊侍于孔子，或交代师徒正在讨论某一个主题，然后颜渊依次问“内事”（本文从陈剑说释作“入仕”）、“内教”和“至名”，然后孔子回答^[23]。四个文本结构的相似性并偶然，而是儒家学派有意识的叙事设计，通过将季氏问对纳入与弟子问对相同的叙事框架以固化特定的政治记忆。出土文本里，季氏父子不像以君主或上司的身份询问意见，而是像学生般向老师请教。编者把季氏悄然“弟子化”，设计成在政治见识上成为低于孔子的存在，最重要的意图就是突出孔子地位的崇高以及识见的高超。

2.3 以季氏形象强化孔子权威

这两篇文献最重要的特征是将季氏父子塑造为类似孔门弟子的形象。这种“拟弟子”策略通过多种叙事手段实现，包括谦逊用辞、不断追问及表达好学之志等。

2.3.1 谦逊用辞

“不敏”是弟子回答孔子时的典型自我形容词。

《论语》颜渊和仲弓问仁，聆听孔子的教导后说：“回/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24]上博简《君子为礼》有相类近的记载，颜渊云：“韦不敏，弗能少居也。”^[25]前者表达对老师教导的心悦诚服，将会全力实践，也表达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后者真切表述自己力不逮，恐怕未能达到老师的期望。两个相近记载里“不敏”的内涵虽截然相反，但仍可推想这是儒家学者用以表示弟子谦逊的常用词汇。另《孝经》开篇记载孔子问及曾子时，曾子回答“参不敏，何足以知之？”^[26]上博简《仲弓》载仲弓曰：“雍也蠢愚，恐贻吾子羞，愿因吾子而辞。”^[27]这些表述的共同特征是弟子以“不敏”、“蠢愚”等自谦之辞，表达对孔子的崇敬与向学之志。

在简文中，季氏父子使用了几乎相同的谦逊语。

《季庚子》记述作为实际执政者的季康子自称“不知民务”^[28]，与颜渊的“不敏”、仲弓的“蠢愚”如出一辙。

《季桓子》载季桓子云“斯不足，岂敢望之？”又说“斯不佞，吾子悉言之犹恐弗知，况其如微言之乎”^[29]。

“不足”、“不佞”与“不敏”同为谦辞，季桓子甚至说即使孔子详细说明，自己也“恐弗知”。季氏父子先谦称自己不足，然后说不能知道或者实行孔子的主张，其谦逊程度已不亚于任何孔门弟子。

这种自谦模式的挪用，具有深刻的叙事功能。在鲁

国，季氏的地位显然远较孔子为高，但在简文里，季康子以“请问”向孔子求教，这与孔门弟子常用的“敢问”完全相同，无形中在矮化季氏的见识和地位。而文本里季桓子（斯）、季康子（肥）、孔子（丘）自称时都直接用名，称呼对方时均用“子”或“吾子”，这种敌体的称谓同时也在强化孔子备受尊崇的形象。编者刻意使季氏运用不符合其政治高位身份的用语，实际上是把季氏纳入“弟子”的角色。

2.3.2 不断追问，塑造好学形象

孔门弟子以“好问”见称。《论语》、《礼记》里子夏、子贡、颜渊等人屡屡追问，这方面出土与传世文献完成一致。《颜渊问于孔子》、《子羔》、《仲弓》等都记载弟子发问和追问，体现了弟子对真理的渴求。

季氏父子在简文中同样展现了“不断追问”的特征。《季庚子》里，季康子的每一个问题都建立在前一个问题的基础上，形成逻辑递进的追问链。《季桓子》同样呈现出连续追问的特征。这种追问模式与孔门弟子的学习态度高度相似，季氏的追问更具有特殊的政治意涵。在孔门语境中，追问主要是为了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在季氏语境中，追问是为了更有效管理国家。这种转换使“好学”从个人德行转化为政治能力，一个不断追问的执政者，被暗示为“好学的执政者”，而“好学”正是儒家推崇的核心质量，这在隐然塑造儒家对执政者的要求。

通过上述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到，季氏父子在简文中被系统地“弟子化”。这恐非历史的真实记录而是叙事的需要。孔子死后，儒家学派刻意将政治对话改变为类近教学场景，将上下级关系重塑为师生关系，目的是提升孔子的名望，并在现实政治争取政治的话语权。在传世文献里，孔子与季氏的关系颇为紧张。《论语》记述的季氏更多是以“礼崩乐坏”的代表出现。例如季氏僭用天子的八佾舞，令孔子发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严厉批判。又如冉求为季氏聚敛财富，孔子更与他划清界线，示意其他弟子群起攻之^[30]。《史记》记载孔子任司寇时曾推进“堕三都”的计划，其后又因为季桓子接受齐国送赠美女不理朝政而决裂。结果鲁国在郊祭后，季桓子不遵守礼法，没有把祭肉分给孔子，令他对鲁国彻底失望而开启周游列国的行程。晚年季康子虽请孔子回鲁，但却尊而不用，孔子始终未能一展抱负^[31]。到了现代，一般人对于孔子的政治生涯并不太熟悉，反而熟知孔子周游列国却屡遭困境，例如厄于陈蔡、被嘲为“丧家之犬”的故事情节，成为孔子记忆的重要部分。惟在战国时期，儒家学派面临的却是如何与

各国执政者合作的现实问题。孔子聚徒讲学，在春秋末年创立了以理想为纽带的特殊团体，孔门弟子有不同专长，而且人数众多，部分年长弟子在孔子生前已获不同国家器重。“仲尼弟子”的身份也成为众人重要的政治本钱，但如果孔子只是一直批判权臣、不肯在政治上有任何妥协的角色，儒家便很难获得执政者的信任，尤其到了第三、四代弟子，孔子在统治者的名声和直接影响力已逐渐消褪，很难单凭“弟子”身份获得重用。如果儒家的叙事是孔子曾经是鲁国大臣也要谦虚求教的“老师”，那么孔子的追随者参与政治就顺理成章。通过将季氏塑造为“弟子”，简文扩展了孔子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力，也为战国儒家提供了理想的政治参与模式，就是孔子不以批评者，而以顾问的身份提供意见，并得到权臣的尊重。儒家一方面高举孔子维持统治者对孔子的关注度，另一方面巧妙地重塑孔子的定位以争取参政机会和话语权。

3 《季庚子问于孔子》、《孔子见季桓子》与战国时期孔子的政治记忆

3.1 口传痕迹：表演性与重复性

目前，对于先秦主要文献是以口头还是书写作为传播的主要媒介，学术界的意见纷纭。柯马丁（Martin Kern）认为先秦时期不存在唯一的原始书写文本，相反经历了一个具有较大文本流动性的阶段^[32]。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33]和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反对先秦文献以口头传播为主，强调文字书写在中国早期文献传播中的重要地位^[34]。然而，与《诗》、《书》等流传已久的文献不同，孔子语录和对答文献必然是在春秋末年，很可能是孔子晚年才开始形成和集结。当时弟子以及再传弟子竞相整理甚至杜撰与孔子相关的记述，故此这批文献沿头不一，而且在战国时期文本极不稳定。《季庚子》与《季桓子》在语言层面保留明显的口传痕迹，这不仅是文本生成的证据，更呈现了记忆传播的方法。阿斯曼指出，文化记忆的建构往往经历从“交往记忆”（kommunikatives Gedächtnis）到“文化记忆”（kulturelles Gedächtnis）的转化过程，而口传正是交往记忆的重要媒介。“交往记忆”依赖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通常限于三代人之内；“文化记忆”则通过文本、仪式等媒介固定下来，可以跨越数千年^[35]。沃尔特·翁（Walter Ong）指出，口传文化与书写文化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存在连续演变的光谱。文本经历从“原始口语文化”（Primary Orality）到“书面固定”（Written Fixation）再到“文学化编纂”（Literary Redaction）的不同阶段。而口传文化中的知识传播依赖

“冗余”（redundancy），为了防止核心信息在传播过程中遗失，必须大量重复已知的内容或使用固定的套语，通过反复陈述强化记忆^[36]。这两篇简文中的重复叙事，正是“冗余”策略的体现。即使听众忘记了具体内容，也会记着“季氏曾向孔子问政”这一重要情节，再结合其他弟子与孔子的问对，各人的身份在接收者的脑海中被绑定，这正是儒家希望传播的关键记忆。

重复的叙事模式体现了口传的表演性，两篇文献均呈现稳定的“问答”结构，这种结构的反复出现不是表达技巧贫乏，而是口头教学需要。季康子、季桓子都是按照孔子的说话而进一步追问，显然他们极度重视和认同孔子的政治纲领，与传世文献孔子经常碰壁的故事相左。前文已论述这种叙事与孔门弟子问对文献高度相似，儒家学派有意识通过将季氏问对纳入与弟子问对相同的口传架构，使季氏被纳入了儒家的记忆共同体。如果孔子的言行只透过口头传播，到了战国时期便很可能会散佚或者只留下不成系统的片段。《季桓子》等的出现显示孔子与当时人对答的文献很可能处于口头和书面传播之间，它们被书写保存甚至成为陪葬品，而且同批被发现的竹简里有楚史的记录，可见孔子问答的文献已经有书面传播的基础而且有一定认受性。文献同时也被选择性地传诵，透过反复诵读、教学甚至重演，带出孔子的权威性。孔子与时人的问答普遍见于出土文献，除了本文所分析的文本外，尚有清华简《邦家之政》、秦家咀简《孔子道秦穆公之事》（简文未尚公开发表）等，可以推论战国时期存在一个以“孔子对话”为核心的文本群，其中既有与弟子的问对，也有与时人的问对。战国时期，孔子已逐渐符号化，而不同学者按照需要，塑造孔子的形象甚至学术主张。目前，这些文献有些被吸收成为了传世文献，例如《民之父母》被纳入了《礼记》，也有不少已经散佚。《季桓子》等文本群表明，孔子作为执政大治顾问的记忆在当时仍被主动传承，未被完全边缘化。

3.2 记忆的竞争与遗忘

这批与政治人物相关的文献只有小部分被《论语》等传世文献承传，转化成为格言式的文本，其他大部分却已散佚。阿斯曼指出，文化记忆的建构不仅依赖“记住了什么”，更依赖“遗忘了什么”。每一个文化群体都会以选择性记忆建构集体认同，群体同时记忆某些过去，选择性遗忘另一些过去^[37]。汉代以后，儒家的意识形态经历重大转型。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从诸子一跃而成为官方学说。统治者在确认儒家治国核心功能的同时，也要把不符合统治要求

的部分排除在外。因此,孔子的形象需要被重新塑造,“政治顾问”、“道德典范”都是从战国以来已成熟的叙事,另一个就是由子贡、宰我开始,而成型于《史记》的“圣人”形象。同时,汉代经纬学说兴起,更神秘化孔子,例如杜撰孔子的感生神话,使他成为能与上古的禹、契、后稷并列的“素王”。这几个重要的叙事系统在互相干扰、排斥和融合,而统治者在政、圣和神之间,选择强化孔子的圣人和先师角色。这种形象转变是为了满足大一统王朝的政治需求,因为统治者需要一个超越具体政治纷争,代表道德教化的孔子,而非一个像管仲、晏婴般能和群主及权臣争辩的政治能手。

《论语》是开宗名义记载“孔子遗说”的书籍,是孔子记忆固化和经典化关键。《论语》的孔子以提倡道德为主,政治论述相对简单。如季康子问政,孔子仅以“政者,正也”回应。这种语录方式将孔子定位为道德导师,而非执行政令的官员。根据《史记》记载,孔子曾为鲁国大司寇,执掌司法和刑狱,又曾诛少正卯(其说最早见于《荀子》)和参与夹谷之盟。时间虽然短暂,孔子确实曾在鲁国政坛具有重要影响力^[38]。他熟悉国家事务,尤其刑法实属正常,但孔子与刑法的关系不断被后世弱化,传世的儒家典籍也简单将刑与德两极化,并以“德治”概括孔子的政治纲领。《论语》“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都明显带有否定刑法的倾向^[39]。那么,《季庚子》中孔子与季氏讨论“大罪杀之,中罪刑之,小罪罚之”的具体刑罚层级,便与以德行为主的先师形象牴牾,不适合“圣人”叙事的超越性。汉代儒家选择保留《论语》、《礼记》里“道德典范”的孔子,并且与“圣人”的形象合流,排斥简帛里作为“政治顾问”的孔子。魏晋以后,带有神秘色彩的孔子也遭到淘汰,只保留在民间的传说和记忆里,这是一种服务于意识形态需求的选择性记忆。

《季康子》等文本整体被遗忘,但其中的部分内容仍以“碎片”形式在传世文献保存。《孔子家语·刑政》记载孔子论“大罪有五,而杀人为下”^[40],与孔子回应季康子“大罪杀之,中罪刑之,小罪罚之”的论述相近。《说苑·政理》也有记载孔子与执政者的讨论^[41]。这些“碎片”表明,孔子作为受执政者尊敬,请教国事的记忆谱系没有完全消失,但却被严重边缘化。这种记忆的竞争与遗忘,揭示了文化记忆的动态特质。诚如顾颉刚所云:“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即在一个时代中也有种种不同的孔子。”^[42]先秦诸子如庄子、墨子、韩非子

的形象鲜明连贯,只有孔子呈现不同面貌,都是为了实际需要而被改变。战国楚简中的“孔子”,是儒家为参与政治而建构的记忆;汉代以后的“至圣先师”,则是一大统王朝为维护秩序而重塑的记忆。

4 结论

本文以上博简《季庚子问于孔子》、《孔子见季桓子》为核心材料,运用叙事学与文化记忆理论,分析战国楚简中“孔子与大臣”对答方式的叙事功能与政治记忆。文献呈现稳定的“问答”结构,叙事者通过季氏建构孔子权威。同时,季氏父子被“弟子化”,他们使用孔门弟子典型的谦辞,展现不断追问的好学姿态,采用尊敬的称谓,与《君子为礼》中的颜渊、《仲弓》中的仲弓相比,季氏的言行模式与孔门弟子高度相似。这些文献呈现了口传痕迹,却在文献经典化的过程里最终被“有意识地遗忘”。

参考文献

- [1]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905-1948及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166.
- [2] Michael Hunter. Confucius beyond the Analects [M]. Leiden: Brill, 2017.
- [3] 杨朝明.《今天应当怎样研究「孔子遗说」》[N].《人民政协报》.2014-08-25.
- [4] 本文所引用的战国出土楚简的文本、编联和释读,除了参考原整理者的意见外,也整理逾百位不同学者的主张而成,详见陈曙光:《新出土战国楚简「孔子与时人对答」读本》数据库[DB]
<https://lin20875.github.io/Confuciusand-Contemporary-Figures-in-Chu-Manuscript/>.
- [5] 顾史考.《古今文献与史家之喜新守旧》,《中国研究集刊》2004(36):57-74.
- [6] 李隆献.《先秦两汉的历史叙事》,载《数理人文》,
<http://yaucenter.nctu.edu.tw/periodical.php>.
- [7] 详见陈曙光:《新出土战国楚简「孔子与时人对答」读本》数据库[DB]:<https://lin20875.github.io/Confucius-and-Contemporary-Figures-in-Chu-Manuscript/>.
- [8] 许懋慧:《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季庚子问于孔子研究》[D],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洪淑玲:《上博六·孔子见季桓子研究》[D],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 [9] 顾史考.《上博竹书孔子语录文献研究》[M],北京:中西书局,2021.

- [10] Gérard Genette, *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 [11] Jan Assmann, *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 Writing, Remembrance,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12] 杨伯峻.《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 2009:20, 136,137,137.
- [13] 杨伯峻.《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 2009:125-126.
- [14] 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7: 977-983.
- [15]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16]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17]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18]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19]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20]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21]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22] 复旦吉大古文字专业研究生联合读书会:《〈上博八·颜渊问于孔子〉校读》, <https://www.fdgwz.org.cn/Web/Show/1592>.
- [23] 陳劍:《上博八·颜渊问于孔子补释两则》[J],《简帛》第七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33-42.
- [24] 杨伯峻.《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 2009:130,130.
- [25]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 [26] 邢昺疏.《孝经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 1999:1.
- [27]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28]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29]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30] 杨伯峻.《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 2009:24,121.
- [31] (汉)司马迁.《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1905-1948.
- [32] 柯马丁着; 顾一心、姚竹铭译:《早期中国诗歌与文本研究诸问题:从〈蟋蟀〉谈起》,《文学评论》[J],2019(4):133-151.
- [33] 夏含夷着,周博群等译:《重写中国古代文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213-214.
- [34] Mark Edward Lewis,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Albany[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4.
- [35] Jan Assmann, *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 Writing, Remembrance,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36] Walter J. Ong,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M], London: Methuen, 1982.
- [37] Jan Assmann, *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 Writing, Remembrance,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38] (汉)司马迁.《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1905-1948.
- [39] 杨伯峻.《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 2009:11,137.
- [40] 王国轩、王秀梅译注.《孔子家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2011:354-361.
- [41] 卢元骏译注.《说苑今注今译》[M], 台北:商务印书馆, 1979: 190-228.
- [42] 顾颉刚.《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J].《古史辨》第2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139.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